

# 华侨问题的政治漩涡： 解析 1959—1962 年中国对 印度尼西亚政策

周陶沫\*



1963年9月3日，来华访问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左一）向毛泽东赠送礼物“天堂鸟”标本。

## 提 要：

本文集中分析从1959年印尼歧视华商条例颁布到1962年印尼成功收回西伊里安主权这段时间，中国对印尼政策的形成背景与发展。这一时期，西伊里安问题和华侨问题是相互缠绕的两条线索。本文认为，东西方两大阵营围绕西伊里安问题在印尼展开复杂激烈的权力斗争，以及由此引发的印尼国内政治的动荡，是排华浪潮爆发与后来平息的根本原因。从争端的产生与矛盾的升级，到冲突的化解与两国关系的缓和，中国一直以防守的姿态等待印尼国内情势和外交政策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转变。中美对峙的基本格局，使得中国认定印尼排华问题的本质是帝国主义挑拨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的阴谋，从而对印尼采取了以妥协争取缓和的基本政策，试图通过团结印尼粉碎美国离间两国的企图。中苏分歧的日益深化，又使得中国一方面乐于看到苏联在印尼的干涉对美国形成制衡，一方面又隐隐预感到中苏可能会围绕印尼展开竞争。同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印尼共产党抛弃武装斗争哲学并未妨碍中共接近印尼共，并争取建立一种基于共同反对苏共霸权姿态的联盟。在对华侨问题以及中共与印尼共的党际关系处理上，中国外交有着与其高亢的舆论宣传相悖的务实的行为特点。

**关键词：** 中国对外政策 苏加诺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对印尼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其一是华人与印尼原住民之间长期存在着因经济地位、文化认同与忠诚感和归属感差异造成的矛盾，这一历史因素在新中国和新印尼出现的背景下，催生了华侨认同、双重国籍等问题，由此造成了中国印尼政策中的华侨问题；其二是鉴于这一时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国内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和中国在亚洲地区积极推动革命运动的大背景，在中苏矛盾日益凸现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对印

---

\* 周陶沫，2007年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法学学士，早稻田大学国际教养学部学士；2009年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法学硕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国际历史学硕士；现为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历史系博士生。

尼政策难免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动荡、分裂的冲击力；第三，中国对印尼政策必然要反映中国同亚非新兴民族国家建立反帝国际统一战线的需要。

这三层内容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极为复杂的历史图景。本文试图通过分析 1959—1962 年间中国应对印尼大规模排华事件的过程，比较清晰地揭示出这幅历史图景的一些基本特点，从而丰富和加深对这个时期中国对印尼政策的理解。选择这个案例是因为它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印尼政策的困境，包括在华侨问题的政治漩涡中，中国如何处理与侨民的纽带以及与印尼共的联系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以及面对印尼反华力量的挑衅，中国如何在维护民族自尊心与争取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支持的战略需要之间做出选择等。此外，中国外交部新公布的档案为研究这个案例提供了很有利的条件。

1959—1962 年间中国与印尼关系的波动引起了相当一部分学者的关注。印尼华裔学者许天堂对华侨在排华浪潮中的生存状况做了细致的历史回顾。<sup>①</sup>作者的着眼点是印尼国内激荡的政治经济环境，只粗略讨论了中国政府对排华事件的反应。美国学者马兹格（David Mazingo）的《中国对印度尼西亚政策 1949—1967》<sup>②</sup>和荷兰学者戴克（Antonie C. A. Dake）的《红色公牛的精神：在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sup>③</sup>等集中分析了影响中国外交决策的诸多因素。综合地看，由于无法获得中国方面的外交档案，多数成果主要以报纸、杂志和政府声明等为基础进行推理、猜测甚至想象。

本文集中分析从 1959 年印尼歧视华商条例颁布到 1962 年印尼成功收回西伊里安主权这段时间，中国对印尼政策的形成背景与发展。这一时期，西伊里安问题和华侨问题是相互缠绕的两条线索。本文认为，东西方两大阵营围绕西伊里安问题在印尼展开复杂激烈的权力斗争，以及由此引发的印尼国内政治的动荡，是排华浪潮爆发与后来平息的根本原因。从争端的产生与矛盾的升级，到冲突的化解与两国关系的缓和，中国一直以防守的姿态等待印尼国内情势和外交政策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转变。中国在克服民族主义情绪、牺牲华侨利益的条件终于实现了同印尼关系的缓和，这表明中国对印

---

① [印度尼西亚] 许天堂：《政治漩涡中的华人》，周南京译，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② David Mazingo, *Chinese Policy toward Indonesia, 1949 - 1967*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

③ Antonie C. A. Dake, *In the Spirit of the Red Banteng: Indonesian Communists between Moscow and Peking, 1959 - 1965* (Hague: Mouton & Co, 1973) .

尼政策实际上遵循着务实的逻辑和态度。

## 一、取缔华人小商：争端的产生与矛盾的升级

1959年5月，印尼商业部颁布《撤销县以下外侨小商店和零售商营业准字和临时营业准字决定书》。<sup>①</sup>随后不久，陆军中央指挥部宣布授权地方军区司令以“安全理由”将外侨转迁离其居住地。<sup>②</sup>8月，印尼政府又上演了一场令华人遭受巨大经济损失的“金融政变”：在宣布大面额纸币贬值的同时，印尼政府决定冻结大部分存款额在2.5万印尼盾以上的银行账户。上述政策对一直在印尼商贸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华裔群体影响最为直接。<sup>③</sup>11月，《总统第十号法令》出台，规定在一级（省）、二级（县）自治区和州首府以外的外侨（实际上主要针对华商）小商、零售商必须在1960年1月1日以前停业；印尼民族企业家或印尼人组织的合作社有权利获得转让及接管外侨小商、零售商企业及场所。<sup>④</sup>此条令颁布后，西瓜哇、苏拉威西等地连续发生武装逼迁事件，大批华侨学校遭裁减、封闭或接管，华侨社团和报刊受到各种限制。

1959年开始的排华浪潮不单纯是印尼社会长期以来对华人敌对情绪的爆发，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印尼国内政治格局的动荡和外交政策的摇摆。在国内政治层面上，针对华侨的禁令是印尼陆军削弱印尼共产党的手段。1958年印尼苏门答腊中部、苏拉威西北部等地爆发叛乱，苏加诺依靠陆军镇压了地方分裂势力。作为交换，陆军得以进入印尼政治的核心。但在苏加诺看来，陆军是一支过于独立的力量。他进而接近、扶植印尼共，以便在今后的政治角力中利用印尼共制约陆军。<sup>⑤</sup>陆军对印尼共的迅速发展十分不满，希望以排华的手段让印尼共陷入两难境地：如果印尼共反对歧视华人的举措，便会在

---

① 范中汇主笔：《将军、外交家、艺术家——黄镇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404页。

② Central War Administrator's Announcement, No. 039, May 12, 1959 (Djakarta, 1959). Quoted in David Mazingo, *Chinese Policy Toward Indonesia, 1949-1967*, p. 159.

③ Lea E. Williams, "Sino-Indonesian Diplomacy: A Study of Revolution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 (Jul. - Sep., 1962), p. 194.

④ 周南京：《苏加诺·中国·印度尼西亚华人》，周南京、孔志远主编：《苏加诺·中国·印度尼西亚华人》，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第58页。

⑤ 杨公素：《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1949—2001）》，香港：励志出版社，2002年，第143页。

反华情绪高涨的印尼社会遭到孤立；而如果印尼共支持排华，则无疑会造成印尼共与其兄弟党——中国共产党的分裂。<sup>①</sup>

在国际政治的层面上，排华不仅是对印尼共的打压，还可能发展成为印尼外交轨道转向亲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一个拐点。在1958年支持地方叛乱推翻苏加诺政权的努力失败后，美国开始调整对印尼的政策，希望缓和与苏加诺的关系。1959年7月，当台湾提出继续向大势已去的印尼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援助时，美国驻印尼大使霍华德·琼斯（Howard Palfrey Jones）表示坚决反对，认为这会将两国关系改善的趋势扼杀于萌芽之中。<sup>②</sup>美国转而向雅加达当局提供包括武器、设备、资金及人员培训在内的军事援助，<sup>③</sup>试图一方面赢得苏加诺的好感，一方面帮助陆军与印尼共抗衡。美国对印尼态度的缓和、争取印尼的外交力度加大与排华浪潮的爆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排华是印尼外交政策左右摇摆在国内政治中的反映。

在上述背景下，北京与雅加达因华侨问题发生摩擦似乎并不为奇，但印尼政府选择以法令形式排挤华人却让中国领导人难以接受。中国与印尼于1950年建交，印度尼西亚由此成为第一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1955年，中国在万隆会议上倡导的亚非团结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精神，以及在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上所做出的重大让步为深化两国关系创造了空间。1958年，当“大跃进”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时，印尼正在经历声势浩大的外岛叛乱。尽管自身也有紧迫的备战需要，中国政府却毅然向印尼政府提供了军事援助和物资供给，帮助其稳定局势。<sup>④</sup>在跌宕起伏，动荡不安的地区形势下，两国关系的发展却稳中有进。然而，考虑到50年代中期开始中方对两国关系的悉心经营以及排华浪潮爆发前夕初见端倪的双边友好互动模式，中方在事件发生后即表示不解和担心。如陈毅所说：“美国人，

---

① David Mazingo, *Chinese Policy toward Indonesia, 1949 - 1967*, p. 168.

②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Indonesi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7, 195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58 - 1960, vol. XVII, Indonesia, p. 239.

③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Indonesia, November 8, 1958, *FRUS*, 1958 - 1960, vol. XVII, Indonesia, p. 303.

④ 关于中国向印尼提供军事援助的记录，见章汉夫接见印尼驻华大使苏加佐谈话记录，1958年5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以下简称外交部档案馆），105-00366-01；陈毅接见印尼大使苏加佐谈话记录，1959年3月9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366-02。有研究指出中国政府向印尼提供了价值2000万美元的陆、海、空军武器装备，参见范中汇主笔：《将军、外交家、艺术家——黄镇传》，第377页。

某些阿拉伯国家和某些东南亚国家反华，我们并不奇怪，它们本来是反对我们的，嫉妒我们独立了。但像印尼这样的和我们命运相同的友好国家进行反华，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忧虑和担心。”<sup>①</sup>

中国在1959—1961年间的安全处境使中国决策者肯定不愿意看到与印尼关系恶化。中国的周边环境从1959年夏季开始恶化，使得毛泽东认为“现在国际上反华浪潮来势汹汹”，而且“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都参与其中”。<sup>②</sup>1959年3月，西藏发生了大规模叛乱，继而造成了中国与印度之间的摩擦。当达赖逃亡印度“避难”后，中印之间的矛盾表面化，双方于1959年夏在边境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与此同时，印度支那地区因老挝局势动荡而趋于紧张，特别是美国明显在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直接干涉。<sup>③</sup>

在外部关系的高度紧张与国内因“大跃进”出现的严重经济衰退和粮食短缺的背景下，中国领导层开始对1957年以来注重“斗争性”的外交政策进行调整。据吴冷西回忆，在1960年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中国领导人基本确定了“努力主动地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的方针。<sup>④</sup>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外交出现了趋向务实的局面。中国加快了与邻国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步伐，并积极争取改善中印关系，缓和印度支那局势。<sup>⑤</sup>相对稳健、温和的外交方针也为中国对印尼政策定下了基调。

华侨问题给中国带来的是两难的政策选择。一方面，虽然两国在1955年就已签订《双重国籍条约》，但印尼方面在审批工作上的拖延导致这一条约在排华浪潮爆发时尚未具有法律效应。中方如果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单方面保护华侨，就会被认为是对印尼内政的干涉。<sup>⑥</sup>另一方面，默然接受印尼政府对华侨的财产剥夺和无理驱逐，则会威胁到中国政府的威信——与国民党政府相比，社会主义中国似乎并不能为海外侨民提供更多的保护。中

---

① 陈毅接见驻华大使苏加诺·维约普拉诺托谈话记录，1959年12月9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389-03。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上册，第234页。

③ 牛军：《中国外交的革命化进程》，杨奎松主编：《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1页。

④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第234页。

⑤ 牛军：《中国外交的革命化进程》，《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第120—126页。

⑥ David Mazingo, *Chinese Policy toward Indonesia, 1949-1967*, p. 160.

方此后一系列举动证明：华侨问题固然重要，但是一个可以为中国全局战略需要而做出妥协的。正如陈毅对印尼驻华大使所言，中国政府“不是完全站在华侨利益的角度来看问题的”<sup>①</sup>。高于华侨利益的是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是在“国际上反华浪潮来势汹汹”的背景下消除美国在亚洲的势力扩张带给中国的安全威胁。

依照当时中国领导人的理解，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紧张的根源并不是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利益冲突，而是美国在中国和一些友好的亚非国家之间挑拨离间。陈毅在1959年12月接见印尼大使时的讲话就体现了这样的战略思考。陈毅特地请大使转告印尼外长和总统，“警惕帝国主义破坏亚洲友好团结的阴谋很重要”。在谈及印尼排华问题的实质时，陈毅提到中印边境问题：“有人说中国侵略印度。但我们为什么要侵略印度？压迫印度？我们的敌人是美国，而决不是印度。印度本身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在它国内的残余问题，印度也需要中国的友谊”。<sup>②</sup> 在中国领导人看来，不论是中印边界问题，还是印尼排华浪潮，反华都是“幌子”，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破坏亚洲国家团结的阴谋。

根据当时领导人的思维逻辑，彻底粉碎美国阴谋的最有力武器，就是进一步加强亚非国家间的团结。尤其是《美日安保条约》的签订，使中国感到受到直接的威胁，亚非团结更被认为是中国缓解自身战略压力的重要途径之一。陈毅在与印尼大使的谈话中特别强调美日安保条约“很危险”，因为“日本可以派军队去海外”，而且“现在日本利用美国资本通过战争赔偿向东南亚国家进行经济渗透”。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日本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而是美国人推行的“亚洲人打亚洲人的阴谋”，利用日本在亚洲制造冷战。陈毅说，“美国的侵略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再起，很危险……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得罪印度、印尼？纳赛尔那样骂我们，我们还是和他缓和。我们这样做，并不是想依靠纳赛尔帮我们打美国和日本的侵略者；如果打起仗来，我们还是依靠自己。亚非团结可以对付美、日威胁。”<sup>③</sup>

---

① 陈毅接见驻华大使苏加佐·维约普拉诺托谈话记录，1959年12月9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389-03。

② 陈毅接见驻华大使苏加佐·维约普拉诺托谈话记录，1959年12月9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389-03。

③ 陈毅接见驻华大使苏加佐·维约普拉诺托谈话记录，1959年12月9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389-03。

上述战略思维是贯穿中国应对排华问题的政策的一条红线，从根本上决定了中方对印尼的基本态度和外交斗争的策略与方式。1959年9月，中国驻印尼使馆分析事态时认为：“印尼当权派中对于华侨问题的处理是有明显分歧的，以苏加诺为首的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主张通过双重国籍问题来解决华侨问题，较注意两国间友好关系；陆军总部一部分危险分子则积极企图通过一系列排华措施造成政府当前财经困难，进一步控制政府，离间中印关系，显然这是和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分不开。当权派上述两种力量的斗争和矛盾仍在发展中，对于华侨问题的解决除非苏加诺本人出面干预，否则争取缓和困难很大。”<sup>①</sup>因此，大使馆建议在与印尼方面交涉的过程中，中方应采取“利用矛盾，区别对待”的方针，即一方面“继续争取以苏加诺为中心的主张缓和解决的力量”，一方面“揭露军事当局所制造的局部事件，防止全面排华的危险”。<sup>②</sup>

1959年秋，观察到排华趋势日益扩大，中方开始向印方强调“维护两国友谊、人道主义、警惕帝国主义挑拨破坏”，<sup>③</sup>并在此基础上采取外交行动。中方于9月初向印尼政府提出措辞审慎的抗议照会。<sup>④</sup>在正式外交渠道之外，中方还通过一些与苏加诺私谊较深的华侨和华裔，向苏加诺反映华侨的不满和不安，以争取印尼官员的同情。<sup>⑤</sup>外交部此后指示使馆：如果在我方提出抗议后印尼军政当局仍然一意孤行，“则应考虑进一步加强华侨群众性斗争的压力”，如通过可靠的左派侨领不声扬地、有重点地、分散且此起彼伏地策动华侨工商界进行各种形式的消极经营，造成市场一时的紧张和混乱。但“时间最多只能两三天”，并且要“切实预防可能发生流血事件”，“尽量避免给印方抓到把柄作为捕人的借口”，“尤其不要造成华侨和印尼人民的群众性对立”。国内决策层认为：“取缔小商看来是难以避免的，斗争得

---

①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对印尼禁止小商问题进行斗争的意见，1959年9月2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610-02。

②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对印尼禁止小商问题进行斗争的意见，1959年9月2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610-02。

③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中印关系中的华侨问题事，1959年8月15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610-02。

④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对印尼禁止小商问题进行斗争的意见，1959年9月2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610-02。

⑤ 中国外交部、中侨委对印尼取缔外侨小商等问题对策的补充措施，1959年9月2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610-02。



好，可以促其转向缓和”。因此，中国在外交斗争中，“一面要坚决斗争以挫其锋芒，另一面也要指导华侨小商不声扬地做好适应环境的准备或前后转让转移等”。<sup>①</sup>

直至1959年底，形势仍未显缓和迹象。12月9日，陈毅向印方提出全面解决华侨问题的三点提议：两国立即交换关于双重国籍条约的批准书；希望印尼政府按照双重国籍条约的有关规定和两国外长联合公报切实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对于那些流离失所、无法谋生或不愿继续居留的华侨，中国政府将根据他们的愿望让他们回国参加建设，希望印尼政府分期分批遣送他们回国。<sup>②</sup> 陈毅在当日接见印尼驻华大使时谈到第三点建议，表示中国现在缺乏劳动力，欢迎自愿归国的华侨，因而撤侨的措施并不是“故作姿态”。陈毅指出，“帝国主义利用华侨问题造谣，说华侨在亚非国家是‘第五纵队’。好！我将‘第五纵队’撤回来，所谓亚非友好的‘障碍’就不存在了。我们主动扫除障碍。消除友好国家的疑虑，使西方帝国主义反动分子没有攻击中国的借口，同时也帮助我们的友好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解决困难。”<sup>③</sup>

然而，中国的外交施压并没有得到预想的效果。对于陈毅的倡议，印尼政府表示同意互换双重国籍问题的批准书和成立联合委员会，且不会阻挠愿意归国的华侨；另一方面则坚持称，对华侨利益的保障不应与取缔小商禁令和《总统第十号法令》相冲突。而且只有在北京方面尊重上述法令的前提下，印尼政府才可能无歧视地保护华侨的权利和利益。<sup>④</sup> 这表明，苏加诺在制止武力逼迁的问题上态度依然暧昧，这表明他不会因为北京的外交压力干预逼迁，以免使自己与陆军、与陆军背后的美国关系陷入紧张。这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自排华事件发生以来，中方的基本判断是，苏加诺虽然有动摇、软弱的一面，但是不会真心反华、排华，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依靠苏加诺。但说服和施压似乎都不能改变苏加诺为自身政治生存所做出的选择，事态的发展挑战了中国对苏加诺的判断。

---

① 中国外交部、中侨委对印尼取缔外侨小商等问题对策的补充措施，1959年9月2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610-02。

② 《陈毅外长写信给印度尼西亚苏班德里约外长 严重抗议大规模的反华排华活动提出三点建议全面解决华侨问题》，《人民日报》，1959年12月12日。

③ 陈毅接见驻华大使苏加佐·维约普拉诺托谈话记录，1959年12月9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389-03。

④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ress Release No. P/52/59, Djakarta, Dec. 13, 1959. Quoted in David Mazingo, *Chinese Policy toward Indonesia, 1949-1967*, p. 170.

## 二、芝马圩事件：冲突的化解与两国关系的缓和

1960年1月，中国与印尼两国双重国籍条约的批准书在北京互换，执行双重国际条约联合委员会也在雅加达展开工作。然而这并没有给局势带来转机。印尼政府不但没有承担遣送华侨回国的责任，军方更对准备回国的华侨进行阻挠和威胁，并且不允许归国华侨带回自己的资金和物品。从5月中旬开始，印尼军事当局又在西爪哇和苏门答腊发动了新一轮的大规模迫迁。<sup>①</sup>1960年夏初，中国与印尼的外交关系似乎已经徘徊在破裂的边缘。然而到了1960年底，这一局面最终以印尼排华活动的基本停止而收场。

帮助中国平息华侨风波的“外援”恰恰来自于印尼陆军——陆军愈发激进的排华举动适得其反地把自己引入了被动的境地。1960年7月3日，西爪哇军事当局在芝马圩出动军警以残暴手段强迫华侨迁出，导致两名手无寸铁的华侨妇女被军人开枪打死。<sup>②</sup>芝马圩事件标志着苏加诺对排华问题态度的一大转折。利用排华反共与滥杀无辜毕竟在性质上完全不同，此时苏加诺已经不能继续坐视不管。<sup>③</sup>另外，排华加深了印尼的经济困难。在排华浪潮中，华人商贩在印尼乡村构建的商品流通网络被彻底破坏，城乡商贸停滞。<sup>④</sup>在这个意义上，印尼政策的收缩也是对排华沉重代价的反应。

从印尼的对外关系层面看，排华停止时，印尼与美国的接近也遇到了结构性的瓶颈。从根本上说，美国在印尼面临着支持印尼反对西方殖民势力与维护荷兰、英国等盟友的殖民利益两者之间的矛盾。<sup>⑤</sup>美国希望通过一定量的军火供应防止印尼投靠社会主义阵营，通过人员培训在陆军内部培植亲美

---

① 参见《印度尼西亚有关当局在西爪哇地区又对华侨进行大规模迫迁活动 并对准备回国的华侨多方阻挠和威胁》，《人民日报》，1960年5月11日。

② 参见《印度尼西亚地方军事当局排华手段日益野蛮 西爪哇华侨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在印度尼西亚有势力集团的策动和支持下 西爪哇军事当局制造屠杀华侨惨案 芝马圩两名华侨被打伤，数人被捕 我驻雅加达总领事要求调查竟被拒绝 千余华侨向当地军部请愿 提出严重抗议》，《人民日报》，1960年7月4、5日。

③ David Mazingo, *Chinese Policy toward Indonesia, 1949 - 1967*, p. 170.

④ 参见《印度尼西亚有势力集团自食恶果 反华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脚》、《印度尼西亚一些负责官员不得不公开承认 排华活动给印度尼西亚经济带来恶果》，《人民日报》，1960年6月16、26日。

⑤ 孙丽萍：《双重矛盾——印度尼西亚与美国关系的历史解析（1949—1966）》，《史学集刊》2007年第2期。

国的力量。但美国更要小心避免自己提供给印尼的装备和技术对荷兰、英国、澳大利亚形成威胁，因此拒绝了印尼政府索取重型武器的要求。<sup>①</sup> 进入8月，印尼与荷兰围绕西伊里安的矛盾冲突升级，印尼宣布同荷兰断绝邦交，美国表示“中立”。在印尼看来，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所谓的“中立”，实质上就是站在荷兰一方，支持荷兰。<sup>②</sup> 七八月间苏加诺可能已经意识到，美国不可能背弃西方阵营的盟友，全力支持印尼武力收复西伊里安。印尼和美国根本目标的冲突为印尼1959年外交政策短暂的“右转”划上了句号。停止排华是印尼疏远西方阵营，接近社会主义阵营必须要做出的外交姿态。

在国内国际因素的共同推动下，1960年7月起，印尼方面开始着手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在芝马圩事件上，印尼方面虽仍然坚持“华侨抢夺武器，导致命案发生”的论调，但表示愿意负担死者的抚恤金及其家属回国的有关费用。<sup>③</sup> 随后，西瓜哇军区司令被调离，武力逼迁的发生大幅减少。8月17日，苏加诺在印尼国庆日演讲中再次强调一切遵循政府纲领的、进步的非本国的力量和资金都将在印尼得到适当的地位和机会。他表示为了实现国家的经济目标，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应当破坏“合作的气氛”。<sup>④</sup>

中方很可能观察到了印尼当局态度的变化。7月12日，中国外交部即指示中国驻印尼使馆，“苏加诺有缓和两国关系的意图，我应抓住这个机会，争取同对方解决一些问题，如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的实施办法达成协议，逼迁华侨能逐步停止下来等”。<sup>⑤</sup> 中方在与印尼交涉过程中的妥协态度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淡化华侨问题，即说明中国对印尼的友好政策一直没有改变，华侨问题本来是比较小的问题，不会从根本上破坏两国友谊。（二）区分华商的利益和中国的利益，即阐明华侨商人中有投机倒把损害印尼的，

---

①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Draft Statement of U. S. Policy on Indonesia, December 19, 1960, 1958 - 1960, FRUS, vol. XVII, Indonesia, p. 577.

② 沈平接见印尼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雷曼谈话记录，1960年8月22日，外交部档案馆，105 - 00701 - 02。

③ 印尼外交部1960年7月23日就芝马圩惨案致中国外交部复照，1960年7月25日，外交部档案馆，105 - 00432 - 02。

④ *Like an Angel That Strikes from the Skies: The March of Our Revolution* ( Djakarta: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1960 ), p. 30. Quoted in David Mazingo, *Chinese Policy toward Indonesia, 1949 - 1967*, p. 179.

⑤ 中国外交部对黄镇同苏班德里约会谈的指示，1960年7月16日，外交部档案馆，105 - 00418 - 03。

中方决不保护这些人；但对华侨中大批小商、小贩流离失所，则不能不感到遗憾。中方希望这些人能按自愿原则加入印尼籍，成为印尼公民。（三）不争论是非，如主动将曾被军事当局无理软禁的外交官调回国内，对印尼称北京电台广播夸大事实的指责表示接受，不追究印尼方面对芝马圩事件起因的歪曲解释等等。<sup>①</sup>

总的来说，在印尼方面态度出现松动之后，中方不但基本放弃1959年秋动员政治上可靠的华侨骨干“不声扬地”进行斗争的战术，还转而小心控制华侨的情绪，避免与印尼方面再次发生冲突，导致印尼政策波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方对棉兰侨胞吊唁芝马圩事件遇难者的处理。由于在追悼仪式上侨民与军警发生冲突，当地侨领被捕，侨团总会遭关闭，侨报被勒令停刊。<sup>②</sup> 事后中国外交部致电驻印尼大使馆，对其工作提出批评，称“棉兰华侨不顾当地军政当局的法令和禁令，强行举行群众性的追悼活动，产生不良后果，这样做对我斗争是很不利的”。<sup>③</sup> 驻印尼使馆在复电中进行了检讨，总结了处理华侨问题的基本原则：“必须很好地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注意适可而止和留有余地；对苏加诺点名要慎重，以孤立最反动的纳苏蒂安集团；在反华排华斗争中必须注意防止和克服民族感情和华侨情绪；根据华侨实际情况和为了印尼长远的革命利益，应使华侨长期居留下来。”<sup>④</sup>

这一时期中方仍然把争取苏加诺看成是争取缓和的关键。在交涉过程中，苏加诺一直在回避和中国讨论华侨问题，中方也观察到苏加诺在排华问题上“躲在背后的地盘”。但中方的基本判断是，苏加诺在排华问题上“阿Q精神虽然不小”，但他缓和局势的愿望对扭转两国关系的走向最为重要。<sup>⑤</sup> 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苏加诺总统的领导，印尼要大乱，帝国主义企图利用

---

① 陈毅接见印尼时报记者纳苏的温和人民日报记者普诺圭谈话记录，1960年8月4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416-06；章文晋接见印尼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雷曼谈话记录，1960年7月21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416-03。

②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印尼棉兰军方关闭侨领等情况，1960年7月23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695-02。

③ 外交部、中侨委请总结棉兰事件的经验，1960年8月7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695-02。

④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关于使馆党委对部委指示讨论和研究的情况，1960年8月12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695-02。

⑤ 黄镇见苏班特里奥谈话简报，1960年7月13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418-03。

极右势力掀起排华运动来推翻苏加诺总统的领导”。<sup>①</sup> 在排华的责任问题上，中方则一直在为苏加诺开脱，即指出中国理解印尼“某些个人的行动，有时政府是不能完全控制的”，并强调最主要的还是两国政府的态度，“只要两国政府都抱着搞好关系的态度，所发生的事情，即使事先不能防止，事后也一定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理”。<sup>②</sup> 因此，在国内的宣传中，有关排华的报道一直没有涉及苏加诺。排华期间，中方不仅两次出版苏加诺藏画集，还努力在新闻报道中维护苏加诺反帝反殖的民族主义领袖形象。<sup>③</sup>

此外，中方还试图以物质援助作为杠杆拉印尼。1960年3月27日，中国与印尼两国政府在雅加达签订议定书，将1958年印尼地方叛乱期间中国政府所提供的两千万美元武器装备改为无偿援助。<sup>④</sup> 在印尼政府态度转变、着手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后，中方又答应给予印方三千万美元贷款，并援助印尼建设纺织厂和训练纺织技术人员。陈毅在与印尼驻华大使、印尼记者谈到援助问题时强调，因为印尼逼迁，使华侨流离失所，中国政府有“为难之处”。“你们逼迁，我们提供援助，这就使我们自己处于难堪的地位，好像我们是在帮助别人排华。对全世界一千三百万华侨我们如何向他们交待？”<sup>⑤</sup> “如果印尼停止逼迁华侨，使他们生活有出路，则我花在接运华侨回国的费用也可用来协助印尼搞建设。”<sup>⑥</sup>

与此同时，中国驻印尼使领馆从1960年8月左右开始贯彻“少撤多留”的方针，大幅缩小撤侨的范围。截至1960年秋，已有6万多华侨归国，中国用于接侨的费用累计超过四千万美元。<sup>⑦</sup> 因此，“少撤多留”不仅是缓和与印尼关系的需要，也是巨大经济负担下的现实选择。在印尼调整华侨政策

---

① 陈毅接见印尼安塔拉通讯社记者苏维多谈话记录，1960年12月28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416-06。

② 章文晋接见印尼驻华使馆代办苏雷曼谈话记录，1960年7月21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416-03。

③ 《全印度尼西亚和平协商会议开幕 苏加诺强调不能听任帝国主义摆布命运 阿巴斯指出帝国主义是造成紧张局势的唯一原因》，《人民日报》，1960年1月28日。

④ 范中汇主笔：《将军、外交家、艺术家——黄镇传》，第377页。

⑤ 陈毅接见印尼安塔拉通讯社记者苏维多谈话记录，1960年12月28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416-06。

⑥ 摘告陈毅同苏卡尼大使谈话内容，1960年11月10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416-05。

⑦ 耿飚接见印尼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苏雷曼谈话记录，1960年11月29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703-01。

后，仍然有众多华侨急欲回国、坚持回国。<sup>①</sup> 中国驻印尼使领馆为应对这一情况，“通过骨干侨领进行说服教育，深入地做调查研究，积极为华侨谋生找出路，把矛盾引向印尼政府方面”。在与印尼地方军政当局交涉过程中，中方外交人员争取与较开明的官员友好合作，避免开大会或在群众场合讲演，对侨团工作采取分散个别布置。到1960年10月末，经过两个多月来各使领馆反复、不断的思想教育，各地难侨不再集中，侨团租约的11艘撤侨商船被退掉，各地贫、难侨重新设法安置谋生，华侨急欲回国的情绪逐渐扭转。<sup>②</sup>

1961年3月，陈毅对印尼的访问标志着华侨问题的政治漩涡终于平息。苏加诺是年6月回访中国时强调说：“即使是两个兄弟之间，有时也会发生小争吵，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之间有时也有些小纠纷，但他们仍然是兄弟。”<sup>③</sup> 事实上，最终促使苏加诺出面干预排华的，与其说是他对中国的兄弟情谊，不如说是印尼实现其自身战略目标的现实需要。由于与美国的接近因目标和利益的冲突走到尽头，印尼的“中立外交”不得不重新向社会主义阵营摆动，而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便是印尼调整外交立场的必要前提。中国察觉到了印尼形势的变化，并采取了适可而止、留有余地的斗争策略，加速了华侨问题的和平解决。

---

① 根据外交部档案记载，截至1960年9月底不完全统计，印尼各地登记要求回国的贫、难侨尚有282931人，其中已经办好离境手续，经劝说但仍坚持回国（多数人房屋财产已经卖掉）的有89421人；已在各地集中生活确实困难无法居留下去，急待回国的（不少人已集中4个月以上）有24161人。很多华侨在4月、5月的回国高潮中把店面、住屋和土地都卖掉，财产也已处理。几个月来等不到船，坐吃山空；到9月已经无能力再用比卖出时高三、四倍的价钱买回。有的生活已陷入极端困难，不得不依靠侨团救济。因此驻印尼使领馆在执行“少撤多留”政策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华侨群众的抵触情绪。有侨民不顾领馆指示擅自集中，“有的威胁要集体跳海”，“有的要拿木棒见领事”，雅加达还有人“装疯（一说真疯）赖在领馆不走”，甚至还有“人吃人”的谣言在雅加达传播。参见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两个月来贯彻“少撤多留”方针的情况简报，1960年10月18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708-02。

②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两个月来贯彻“少撤多留”方针的情况简报，1960年10月18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708-02。

③ 黄阿玲：《〈中国印尼关系史简编〉摘录》，周南京、孔志远主编：《苏加诺·中国·印度尼西亚华人》，第91页。

### 三、西伊里安问题：中苏分歧深化阴影下的中国对印尼政策

使印尼外交 1960 年重新向社会主义阵营摆动的“推力”来自于美国，“拉力”来自于苏联。以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为分析框架，苏联对印尼收复西伊里安的物质支援可以防止美国在印尼势力的继续扩大，间接削弱印尼国内的反共力量，促使印尼军政当局为接近社会主义阵营而停止排华。然而，在中苏分歧日益深化的背景下，苏联在印尼影响力的增长可能对中国形成新的威胁。

印尼排华从爆发到缓和的过程，也是中苏矛盾逐渐尖锐化、表面化、并徘徊在公开化边缘的一段时期。尽管在 1960 年制定的稳妥务实的外交方针引导下，中国也做了改善中苏关系的尝试，但这没有、也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两国、两党之间深层次的分歧。<sup>①</sup>

这一无法弥合的分歧同样也体现在苏联对印尼排华问题的处理上。1960 年 2 月，赫鲁晓夫在排华高潮对印尼进行访问，并宣布苏联将向印尼提供 2.5 亿美元的新贷款。西方媒体称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决定，对北京而言这几乎等同于当头一棒。<sup>②</sup> 但从目前可获得的档案资料看，中方似乎并没有愤然地将赫鲁晓夫访印解读为苏联对印尼排华的支持和对中国的挑衅。中国驻印尼使馆向国内汇报的情况是：印尼“某些中间力量幻想通过赫老（赫鲁晓夫）的访问对我施加压力，希望赫老能谅解印尼排华，并借机挑拨中苏关系”。<sup>③</sup> 虽然很难确定中国在当时究竟如何判断赫鲁晓夫访问印尼的动机，但可以肯定中国对这次访问的效果评价不高。中国驻印尼使馆反映：“印尼官方对赫的欢迎表面上热烈隆重，实际上大都是官样文章，没有超过欢迎一般国宾的‘规格’，苏加诺的陪同只是为了借赫老抬高自己的身价，并准备

---

① 对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概述，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513—546 页；牛军：《中国外交的革命化进程》，《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第 118—148 页；陈兼：《革命与危机的年代》，《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第 89—110 页。

② *New York Times*, January 7, 1960. Quoted in Antonie C. A. Dake, *In the Spirit of the Red Banteng: Indonesian Communists between Moscow and Peking, 1959 - 1965*, p. 64.

③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印尼政府对赫老访问的态度，1960 年 2 月 14 日，外交部档案馆，105 - 00713 - 01。

向苏方大量需索而已”。<sup>①</sup>

中方认为，“印尼统治集团”对赫鲁晓夫访问的基本态度是“我要你的钱，但不要你的政治影响”。根据中国的观察，苏加诺对赫鲁晓夫的访问抱极大希望。由于印尼当时经济情况极端困难，民怨沸腾，苏加诺想通过吸收苏联的大量贷款，稳定人心、巩固内阁地位，“同时也想冲淡排华的恶劣影响，表示他仍旧‘中立’”。“在双方正式会谈之前，赫鲁晓夫在公开讲话中曾几次提到愿意大力帮助印尼，所以印尼对苏方的底盘基本上是清楚的，但不知苏愿帮助多少。苏方也知道印尼一定要在他们身上敲一笔，但不知印尼到底要什么。”在摸清了苏方援助的大体金额后，苏加诺就“大讲苏联好话”，“甚至在家里和赫老一起唱歌”，而且和以前“神态大不相同”。在中国看来，苏联所提供的贷款数量高于印尼官方的预期，但印尼仍然强调其国内的全面建设计划共需五亿美金，还要到其他国家寻求援助，从而“给美国留有余地，也可能借此向美国伸手”<sup>②</sup>。

中方也注意到，苏联在向印尼提供用于经济建设的贷款的同时，也增加了对印尼收复西伊里安的军事援助。1960年3月，中国驻印尼使馆从苏联驻印尼使馆武官处得知，苏联应苏加诺要求派海军顾问团协助印尼建设海军，但却因陆军亲美势力的阻挠，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印方的接待。中国驻印尼使馆武官处的电报称：“我们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印尼统治阶级不愿苏联影响扩大，也不打算真正依靠苏联，因此印尼是否接受苏海军顾问团恐怕还是问题。”<sup>③</sup>1961年1月，由陆军参谋长纳苏蒂安（Nasution）将军率领的一个军事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从苏方获得4.5亿美元的军事贷款。苏方表示愿向印尼提供战斗机、远程轰炸机、军舰和其他重型武器。<sup>④</sup>在中国，《人民日报》以十分含糊的方式报道了这一消息，极其笼统地称“苏联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代表6日在莫斯科签订了苏印（尼）协定”。<sup>⑤</sup>虽然目前还没有直接资料能够揭示苏联对印尼的军援究竟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

---

①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赫鲁晓夫访问印尼情况，1960年2月29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713-01。

②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赫鲁晓夫访问印尼情况，1960年2月29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713-01。

③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武官处：关于苏联海军顾问团访印尼情况，1960年3月7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713-01。

④ 许天堂：《政治漩涡中的华人》，第717页。

⑤ 《苏联和印度尼西亚签订协定》，《人民日报》，1960年1月8日。



是，印尼与苏联的接近也就意味着印尼与美国的疏远，这对中国来说应该是十分有利的。然而，由于中苏分歧的存在，印尼与苏联的接近并不意味着印尼与中国的接近。

在这样的两难困境下，对中国而言最为保险最为明智的做法，就是尽快和平解决华侨问题，在苏联与印尼的接触进一步加深之前，改善自己同印尼的关系。然而，因国内经济严重衰退，中国不能像苏联那样承担对印尼的巨额军事援助，因此只能继续在道义上声援印尼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事实上，中国的支持的确未曾因排华而中断。中国政府一再向印尼方面重申，无论两国关系中发生什么样的困难，中国依然支持印尼维护自己独立和主权完整的斗争。<sup>①</sup> 即便是在排华风波的顶峰，在宣传上中国依然站在印尼的立场上控诉荷兰增兵西伊里安。<sup>②</sup> 排华活动得到初步遏制后，周恩来在印尼独立十五周年的招待会上致词说，中国人民将全力支持“我们的友邦”同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正如印尼人民支持我们为解放台湾而进行的斗争一样。<sup>③</sup>

然而，在缓和的氛围下，西伊里安的最终解决并没有演变成美、苏在印尼的一场对决。为了抵消苏联对印尼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抑制印尼倒向共产主义阵营的趋势，肯尼迪政府改变了在西伊里安问题上的中立政策，通过外交手段使荷兰从西伊里安体面地撤出，最终促使争端双方在1962年8月签署了和平解决西伊里安问题的协议。<sup>④</sup> 由于美国对印尼的缓和政策，印尼没有动用苏联的重型武器便收复了西伊里安。在西伊里安问题解决后，东、西方阵营的力量分布在印尼再次形成了新的平衡——苏联和美国在印尼的相对影响力和势力都没有扩大。应该说，这样的结果是中国最想看到的。只有在印尼既不倒向美国，又不倒向苏联的前提下，中国才有可能

---

① 章文晋接见印尼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雷曼谈话记录，1960年7月21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416-03。

② 参见《荷兰殖民者增兵西伊里安激起愤慨 印度尼西亚人民纷纷举行示威》、《反对荷兰殖民者增兵 西伊里安人民示威罢工 群众要求把西伊里安归还印度尼西亚》、《反对荷兰增兵西伊里安 要求殖民主义者滚出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青年学生愤怒示威》、《印度尼西亚合作议会十二名西伊里安议员要政府坚决对付美荷帝国主义 谴责美国支持荷兰殖民者并阴谋在西伊里安建立基地》，《人民日报》，1960年5月16、25日，6月4日，7月8日。

③ 《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在苏雷曼临时代办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说中国支持印度尼西亚反殖民主义斗争》，《人民日报》，1960年8月18日。

④ 孙丽萍前引文，《史学集刊》2007年第2期。

保持与印尼关系的稳定发展。

与此同时，另一个可能影响中、苏、印尼三角关系走向的因素是印尼共会在中苏之间选择偏向哪一方。直至 50 年代末，印尼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直保持相对独立，但从根本上承认苏联的领导地位。面对日益深化的中苏分歧，中国对印尼共走向的估计显得较为乐观。首要原因是，在 1959—1960 年间的排华浪潮中，印尼共几乎是印尼国内唯一坚持声援华侨、声援中国的政治力量。印尼共尽管也表示基本支持取缔华人小商和《总统第十号法令》，同时也还强调中国与印尼两国之间的友好，华侨对印尼经济的作用以及“帝国主义破坏中国与印尼关系的阴谋”。中方对印尼共在华侨问题上的表现应当是较为满意的，认为“印尼共积极支持和配合反排华斗争”。<sup>①</sup>

实际上，印尼共采取这一态度并不是为了捍卫两国之间的友谊或两党之间的同志情谊，而是自身政治生存的需要。如上文所提到的，1959 年开始的排华浪潮实质上是陆军打压印尼共的一种方式。印尼共一旦屈服于军方的压力，便会被彻底驱逐出印尼的政治舞台。印尼共所能做的，就是在抵抗的同时等待苏加诺的救援。而印尼共在华侨问题上的立场，并没有妨碍它在中苏之间继续保持中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继续低调地坚持独立。中方观察到，印尼共“对各国兄弟党的关系，一面强调平等关系，独立自主，一面承认苏共的先锋作用，但没有提以苏联为中心”。艾地说：“印尼共产党人中间可能有人认为苏共对其他共产党的领导是应当的事情，这是错误的。”但他同时也不忘强调，“苏共和苏联人民是打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堡垒的先锋，这个问题像白天那样清楚”。<sup>②</sup>

印尼共一直以来都坚定地支持苏加诺收复西伊里安的主张，因此为印尼带来巨额军事援助的赫鲁晓夫得到了印尼共极其热烈的欢迎。在笔者所掌握的外交部档案中，中共对印尼共在赫鲁晓夫访问时做的工作仍然持肯定态度，认为印尼共“使赫老有机会接触到部分印尼人民的热情，同时也鼓舞了在饥饿和独裁威胁下的人民的斗志”。<sup>③</sup>但同时，中方也注意到，赫鲁晓夫

---

<sup>①</sup>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动态》（第三期），1960 年 4 月，外交部档案馆，105-00980-03。

<sup>②</sup>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各国共产党动向》，1959 年 5 月 11 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919-01。

<sup>③</sup>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动态》（第二期），1960 年 3 月，外交部档案馆，105-00980-02。

访问期间，印尼共领导人的言论中“对美帝国主义破坏亚非团结的批判较多，对于揭露美帝国主义‘假和平，真备战’阴谋以及保持革命警惕性等说得较少”。印尼共第二副主席约多（Njoto）在1960年1月的讲话中曾说，在1960年里，各民族间的友好关系将由于艾森豪威尔之访问苏联，赫鲁晓夫之访问印尼而更加密切，并认为1960年将成为“全面和平的一年”。对此，中方的评价是：“将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访问（美总统访苏和赫老访问印尼）并提”，且“‘全面和平’的提法似乎亦片面”。<sup>①</sup>

中方也注意到，印尼共在谨慎维系与苏共关系的同时，还在接近遭到苏联严厉制裁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就在赫鲁晓夫结束对印尼的访问后不久，印尼共应阿共邀请对该国进行了访问。印尼共与阿共发表的联合公报指出：两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许多问题“看法完全一致”；“美帝国主义不放弃他们的实力政策和冷战政策，必须加强和提高对国际反动派的革命警惕性”；“在当前条件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是现代修正主义”。艾地从阿尔巴尼亚归国后向中国驻印尼外交人员表示，阿共虽然在欧洲很年轻，但是领导得很好，是反对修正主义最坚决的党，对修正主义的危害体会的很深刻。<sup>②</sup>当赫鲁晓夫在1961年10月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对阿共发动猛烈攻击时，印尼共保持了沉默。会后，毛泽东与自莫斯科途径北京回国的艾地说：“赫鲁晓夫这个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他每年总要搞一两次新花样，苏共二十大花样特别多，指桑骂槐，明里骂阿尔巴尼亚，实际上是骂中国。现在，赫鲁晓夫、肯尼迪，铁托、尼赫鲁，都搞在一起了，东欧和西欧的共产党也都在点名骂我们了。我看赫鲁晓夫是一个反面教员。”<sup>③</sup>

印尼共的主要不满在于苏共对阿共内部政策的干涉。艾地归国后发表声明：“归属社会主义阵营，不是由主观的评价来决定，而是取决于客观的事实：一个国家真正建设社会主义，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阿尔巴尼亚乃是建设这样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赫鲁晓夫同志本人不否认这点。”艾地同时强调：“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独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它跟其

---

①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动态》（第二期），1960年3月，外交部档案馆，105-00980-02。

②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动态》（第一期），1960年1月，外交部档案馆，105-00980-01。

③ 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同志谈话记录，1961年11月17日，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551页。

他共产党同享平等的权利，不受别的党领导，当然也不领导别的党。”但另一方面，艾地也宣布“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支持苏共在个人迷信方面批评了斯大林”。<sup>①</sup> 由于苏联对解放西伊里安的支持对印尼共巩固自身地位十分重要，印尼共仍然悉心维护着与苏共的关系。但印尼共反排华的立场和维护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态度在中国看来已经预示了其未来的走向，毛泽东在苏共二十二大后与艾地的那番谈话多少暗含了中共对印尼共的一种信任和期待。

## 结 论

在亚太区域的国际关系网络中，这一时期中国与印尼关系发展的背景是美苏关系趋于缓和，中苏同盟矛盾升级以及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干涉逐步加深。美国在东南亚的政策和中苏关系都在影响甚至决定着中国对印尼政策的演变。中美对峙的基本格局，使得中国认定印尼排华问题的本质是帝国主义挑拨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的阴谋，从而对印尼采取了以妥协争取缓和的基本政策，试图通过团结印尼粉碎美国离间两国的企图。中苏分歧的日益深化，又使得中国一方面乐于看到苏联在印尼的干涉对美国形成制衡，一方面又隐隐预感到中苏可能会围绕印展开竞争。同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印尼共产党抛弃武装斗争哲学并未妨碍中共接近印尼共，并争取建立一种基于共同反对苏共霸权姿态的联盟。在对华侨问题以及中共与印尼共的党际关系处理上，中国外交有着与其高亢的舆论宣传相悖的务实的行为特点。

中国对印尼务实政策的形成主要由两大结构性因素决定：首先，中国外交在这一时期的总体趋向较为灵活、稳健，因而为中国对印尼形势做出冷静、客观、实事求是的判断奠定了基础；其次，建立反美统一战线是中国最为迫切的战略需要。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苏加诺领导下的印尼被中国领导人视为可以分担同美国对峙的战略压力的反帝战友，维护与苏加诺政权的友好关系成为中国在印尼最为关键的利益所在。面对 1959 年严峻的安全形势，中国在华侨问题上采取克制与退让的策略从根本上是为了避免双边关系的破裂，以致中国在东南亚地区陷入背腹受敌的处境。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中国在印尼追求的是实际且有限的政策目标。在华侨问题的政治漩涡中，中国保持了谨慎的姿态，避免了因过激对抗可能给两国关系制造的损害。

---

<sup>①</sup> 《在欢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的会上 艾地同志谈苏共二十二大》，《人民日报》，1961 年 12 月 1 日。

Consequently, the theme of the Cold War also experienced subtle yet profound changes—largely because of China's influences, the Cold War was made a phenomenon much broader and more complicated than the mer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capitalist West and the socialist East.

**Working Ahead of Time: Labor and Modernization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AZARA Railway / Jamie Monson**

**Young Scholars' Forum**

**Competing with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Third World: Tito's Trip to Asian and African Countries, 1958 – 1959/ Jovan Čavoški**

**Soviet Polic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nd the Chinese Challenge in the 1960s / Jeremy Friedman**

**The Soviet Union's Plan to Participate in Second Afro-Asian Conference and Its Strategy toward China / Andrey Edemskiy**

**Chinese Policy towards Indonesia, 1959 – 1962 / Zhou Taomo**

**Abstract:** This article looks at the period that began with the announcement of a ban on alien traders by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in 1959 and concluded with the victory of Sukarno's campaign for the incorporation of West Irian into Indonesia in 1962. The overseas Chinese dispute and the West Irian issue are two intertwined threads in the explanation for the course of changes in China's Indonesian policy during those three years. The article finds that the intense yet sometime implicit contest among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over West Irian was the fundamental cause for Djakarta's promotion of discriminatory measures in spring 1959. China's diplomacy was very much thrown onto the defensive as it patiently waited for the change of Indonesian foreign poli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owards a more favorable direction. Based on the very understanding that the souring of Sino-Indonesian relations was caused by an imperialist conspiracy to weaken Afro-Asian unity rather than by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Beijing adopted an accommodating attitude in search of reconciliation with Djakarta. The imperative for the PRC to achiev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dispute through compromise was reinforced by the increase in Soviet involvement in Indonesia at the height

of the Sino-Indonesian friction. Beijing's constrained and cautious attitude demonstrated a certain degree of flexibility and realpolitik strategic thinking which contradicted its clamorous propaganda.

### **United States and the First Wave of Latin American Movements / Du Juan**

**Abstract:** In the 1960s, the Latin American Guerrilla Movement reached its first high tide. The U. S. government considered it as the outcome of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s common efforts, believing that this force posed a threat to the economic, and security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Latin America. In order to protect its own national interest and keep Latin America away from the threat of communism, the U. S. government performed a series of Anti- Guerrilla Warfare Policy measures in Latin America with both hard and soft tactics. These measures fulfilled the short-term military object of fighting against communist movement and got a stage success of counter-insurgency, but because of the inner contradiction of this policy, it hadn't reached the aim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As a result, the United States failed to eliminate the deep-rooted reason for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this sense, the United States only achieved a partial success in its Anti-Guerrilla Policy in Latin America.

## **Oral History**

### **The Korean War in the Words of Soldiers from Four Countries ( Part Two ) /**

Compiled and translated by Li Xiaobing

### **A New Mission in the Forests of Sub-Saharan Africa—Record of Interview with Senior Ma Faxian on his Training of Military Personnel in Africa (3)**

## **Information about Archives**

###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Microfilm Collection on Russian History Housed at the Harvard University Library / Cui Haizhi**

## **Archives and Documents**

*Foreign Archives and Documents · Chinese Archives and Documents*